

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之话语形成

——兼谈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启示

田海龙

(天津外国语大学 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

摘要：不同于关注批评话语分析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文献综述，本文借助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论述，对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发展的话语实践在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策略四个层面的话语形成进行考察，发现批评话语分析并非仅是学者发表其学术观点的表达行为，也不是简单地在推理体系中运作的学术写作活动，而是一部话语史，其中充满了对抗、变化和偶然。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权威和影响及相关话语的互动与角力构成了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形成的主要内容。如此分析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对于思考学术话语体系构建的议题具有启发意义，由此提出相关的几个思考问题。

关键词：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形成；话语史；话语实践；话语体系；构建；思考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65X（2019）1-0001-12

一、引言

自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福勒（Rodger Fowler）等人 1979 年在《语言与控制》一书中提出批评语言学至今，批评话语分析这一探索话语与社会辩证关系的研究范式已经有 40 年的发展历史。尽管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和 21 世纪的最初几年经历了几次大的争论，遭遇到来自学界其他研究范式的许多批评，但是批评话语分析

收稿日期：2018-12-08；修订日期：2019-01-03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学术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与国际学术话语的交流策略研究”（14BYY070）

作者简介：田海龙，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社会语言学、社会符号学、批评话语分析、话语与翻译研究

现在已经毫无悬念的成为一支普遍公认的世界性的重要学术流派。这种学术地位的确立不仅体现在从事这类研究的学者众多，遍布世界各地，而且体现在它的理论原则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研究方法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尤其是在高度发达的媒体技术得到广泛应用的今天，社会各领域中的特定话语无时无刻不在与其他领域中的话语互动，并形成杂糅，这一研究范式为解构隐藏在交流中的“秘密”而提供的理论概念和分析框架更显重要。

然而，回顾其 40 年的发展我们也会发现其从弱到强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话语实践的过程。无论被称为批评语言学，或是批评话语分析，抑或批评话语研究，甚至直接称作话语研究，批评话语分析所处的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明显带有与其他侧重语言运用的研究传统（如会话分析、语篇分析、语用学、系统功能语言学、社会语言学）不同的特征，并形成特有的发展轨迹。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通过自身的话语实践不断形成和深化其研究对象，借助自身的学术影响和相应的学术平台反复凸显其研究内容，在与其他学者的辩论中广泛拓展自身的学术思想。我们将借助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有关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的论述，考察与这一研究范式相关的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及策略的话语形成，以期发现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实践对其发展壮大的贡献，并讨论当下对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关注可能从中获得的启示。

二、研究的源起：理论与问题

作为 20 世纪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福柯的后现代主义思想体现在他对疯癫史、人文科学史、临床医学史、监狱史以及性史的研究之中。在他看来，后现代主义推崇的话语建构性具体体现在话语与话语的联系上面，如互语性（interdiscursivity）和互文性（intertextuality）两个概念所体现的话语之间的联系。在著名的《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从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四个层面论述陈述与陈述之间的关系，即是阐释话语之间关联作用的一个示例。所谓陈述（statement）可以理解为是对某一问题的说明，如说“他疯了”是一个陈述即是说这句话是对他有疯病这个事实的陈述。福柯所说的陈述因其是对某一事实的再现，实际上与批评话语分析中话语的概念相似^①。在这部著作中福柯通过观察医学、自然史、语法、政治经济领域中关于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四个层面的陈述，说明每一层次上陈述与陈述之间存在的联系对话语形成来说都非常重要，并以此强调这些联系体现着陈述的话语形成规则。

福柯的话语形成思想在医学领域中的对象这一层次上，体现为其对疯病这一知识对象通过话语得以形成的过程进行的研究。他认为，决定是否是疯病的根据不是疯病本身，或者说不是疯病的特征，而是疯病与其他相关对象的联系。因此，导致

疯病这个知识对象话语形成的条件就是行为方式、规约系统、分类方法以及概括模式等。福柯（Foucault, 1972）认为，在某一知识对象的话语形成过程中起关键作用的是该对象与它所联系的其他对象之间的关系，而不是知识对象本身。

福柯在对象及其他三个层面关于话语形成的论述将在下文结合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进一步讨论。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福柯在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四个层面上对话语形成的研究，构成了他知识考古学的基本内容，这对考察批评话语分析本身的话语实践具有启发意义。在我国的学术领域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综述已有很多，但是不论早期对批评语言学的介绍（陈中竺，1995）、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述评（丁建新、廖益清，2001），还是后来对批评语言学发展到批评话语分析（田海龙，2006）、批评话语分析发展到批评话语研究（田海龙，2016a）过程的深入分析，抑或是依据科学图谱和计量学对批评话语分析的综述（穆军芳，2016；朱慧超、李克，2017），都在挖掘批评话语分析自身的理论根源，讨论它连续同质的发展变化，概述它自身理论方法的总体性全貌，这就如同福柯眼中传统的观念史，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探寻历史的起源，在描述一个连绵不断、承上启下的过程，在重建一个历史时期所有现象所共享的意蕴。福柯的知识考古学与此不同，认为思想发展中最本真的东西存在于话语的断裂处，栖居于话语布展的边界，因而他的知识考古学关注的是思想发展史中的非连续性，是那些被传统史学家、思想史学家有意删除的“零落时间的印迹”（Foucault, 1972: 8）。依据福柯对话语形成的阐释，我们对批评话语分析发展的考察就可以与关注起源、连续性和总体性的观念史性质的文献综述有所不同，就不需再沿着线性逻辑讲述批评话语分析有始有终、连续同质的变化总体，而是可以换一个角度，关注批评话语分析自身发展中的非连续性和断裂，进而去发现批评话语分析在与旧的研究范式抗争中，如何通过话语实践实现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四个层面上的话语形成，最终发展成一个被广泛认可的研究学派。

三、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形成

我们将采取一种与上文提到的批评话语分析综述文章不同的路径来考察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的发展历程，这一路径福柯称之为话语形成，具体来讲就是从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四个层面上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形成，发现其话语实践的特征。

1 对象的话语形成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是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Fairclough & Wodak, 2012: 16）。然而，这一研究对象并非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从批评话语分析诞生之日就明确的。依据福柯的知识考古学研究范式可以发现，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是在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话语实践中不断形成的。这一话语形成过程可以从如下四个方面

来考察。

第一，福勒关于批评语言学的论述与其前期的文体学研究发生分化，同时与当时的变异社会语言学产生断裂和边界，从而界定出新的可命名、可描述的对象，形成最初的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福勒早期从事文学批评的研究，尤其在文体学领域颇有建树。根据丁建新和廖益清（2001：306）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英国文学批评研究曾主张除了具体的语言结构研究外，文学批评应融入专业的现代语言学方法。福勒赞成这一主张（Fowler, 1966），并运用主流语言学（如乔姆斯基的转换生成语法）进行文学作品研究（Fowler, 1971）。然而，在70年代后半期文体学家们不再满足于文学语篇的形式，开始关注文学作品与社会历史的关系，这样便与主流语言学所专注的形式结构研究产生了冲突。在这种背景下以福勒为代表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研究团队以韩礼德（Halliday, 1973, 1978）提出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早期理论为方法，将分析的语料集中在大众媒体的新闻报道上，揭露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意义（Fowler et al., 1979），与以前的文体学研究传统形成分化，同时也与早期的变异社会语言学产生断裂（田海龙，2006），进而划定新的研究领域。这一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正如福柯所言，体现出某些陈述达到了一定的合理化程度，拥有了一定的概念编码和理论类型，以致于它们在话语中占据较为独特的地位，显现出个体性差异（Foucault, 1972: 41）。

第二，权威性界定的影响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具有一定作用。所谓权威性界定的影响可以包括福勒本人的学术影响，包括他所任职的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学术影响，包括他领导的研究团队，甚至包括其出版的学术著作，这些都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与其他对象的区分和分化产生作用。之后延续这一传统的学者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代克也以其在学术界的影响力帮助加深这一断裂，使得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更加鲜明的确立起来。可见特定机构和从事特定职业的人群拥有相应的知识与实践经验，也拥有公认的权威，他们关于研究对象的界定、区分、命名和建立因而也具有权威，而对象则在这种权威界定的话语实践中形成。

第三，话语的关系网络是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形成的重要因素。话语关系网络中的话语，依据沃达克（Wodak, 2012: 229）关于“一个话语的定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其宏观主题”的认识，可以是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也可以是批评话语分析与之断裂的话语，还可以是质疑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这些不同的话语相互作用，彼此关联，构成一个复杂的话语域（Foucault, 1972: 23）。在这个话语域中各种话语之间不断产生陈述方式、概念和策略的冲突与融合，导致某个话语对象的初步分化（initial differentiation）（ibid.: 41），并在一定的物质载体中得到体现。就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而言，研究对象在各种话语的相互作用下初步分化出来，

并在批评语言学最初的学术著作《语言与控制》(Fowler et al., 1979) 中体现出来，即是福柯所说的话语对象得到初步分化的物质存在。

第四，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并不以其初步分化的物质存在为标志，相反是这一对象的形成方式，是围绕这一对象的陈述在出现、界定和细化等要素中建立关系群的方式。就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而言，话语与社会的辩证关系首先出现在批评语言学的话语与其他话语的相互关系之中，在复杂的话语域基础上获得自身的独特性，但这并非是其最终阶段，这一对象依然在各种关系间被不断界定和细化。例如，批评语言学在形成之后的十年发展中不断遇到新的关于话语与社会关系的学术话语，如批评社会科学以及后现代社会变革批评研究的成果，费尔克劳(Fairclough, 1989)关于话语与权力的学说，沃达克(Wodak, 1989)关于语言、权力和意识形态的学说以及范代克(van Dijk, 1984)对话语中歧视现象的剖析。这些话语形成一个关系群，彼此之间在话语内部有词汇、术语以及语句的联系，在话语外部也有学派和领域之间的联系，但是就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而言，起到关键作用的正是这些话语自身作为实践所构成的关系(Foucault, 1972: 44-46)。批评语言学发展到批评话语分析的阶段形成新的（虽然不是崭新的）研究对象和关注(田海龙, 2006)，也使这些研究对象以新的物质载体的形式（如新的著作、期刊和会议）出现，以形成与批评语言学的断裂，纠正其缺陷，凸显自身的独特性。这是一个不断延续、反复断裂的过程。在批评话语分析的相关话语中依然进行着话语的界定与细化，不断诞生新的对象，产生新的独特性和断裂，在不同研究方法中产生不同侧重点。例如，对于话语与社会的关系，费尔克劳的辩证-关系方法关注话语秩序，沃达克的话语-历史方法关注历史话语，而范代克的社会-认知方法关注语境模型等(田海龙、赵芃, 2012)。这些新对象身处的话语域既包含某些共享话语，又各自与其他话语相区别从而产生差异。这些差异赋予话语以生机和变化，却又遵从同样的话语形成规律(Foucault, 1972: 38)。

2 陈述方式的话语形成

所谓陈述方式(enunciative modality)，福柯认为体现在观点内容、形式、描述风格、推理类型、因果类型等的陈述上面。依据福柯(ibid.: 50-52)的观点，陈述方式是多样的，它的话语形成也涉及多个因素，包括主体地位(status)、机构场景(institutional site)和情景(situation)之间的相互关系等。换言之，考察陈述方式的话语形成需要考察谁在话语中进行陈述，但这并不是追溯思想的源头，或将话语归于某些个人的意识，而是要考察主体的定位。

在讨论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时，我们认识到批评话语分析倡导者的主体地位，他们的知识与能力，他们所依托的研究机构、教学体系和教学规范，

他们具有的扩展知识的条件，他们与其他同样拥有重要地位的学者和机构保持的联系或存在的差异，都对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的话语形成起到重要作用，同时也影响着批评话语分析的陈述方式，决定着批评话语分析表达的观点内容与表述的文体风格。

福勒等人在文学批评和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地位使他们拥有相适配的知识与能力，拥有以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机构为支撑的影响力，从而拥有实践和扩展知识的权力。他们还与具有一定地位的其他个人或组织建立联系和差异的体系，如对主流语言学的反叛、对系统功能语法的认可等。以这样的主体身份展开的陈述将在社会整体发挥作用。话语的陈述方式会随着机构场景而变化，如书籍的出版、学术会议的召开、研究项目的开展等，都引发独特的陈述方式的话语形成。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的转变就是在一系列复杂的场景中在主体间不同形式的陈述中得以确立。值得关注的是，主体是定位于不同的领域和对象群所形成的情景之中，因而拥有不同的工具性中介和信息网络（Foucault, 1972: 52），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主体的陈述方式。就批评话语分析而言，在后现代思潮的冲击和文学批评、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影响下，福勒等人身处的信息网络和有关话语对象的感知都在发生变化，由此改变了他们对话语与社会关系的陈述方式。这些要素的相互关联影响着主体的定位，促使批评语言学形成了独特的分析方法，“开创了将语言研究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的新路径”（田海龙、赵芃，2012: 4）。

作为批评语言学的主体，福勒的身份定位决定了其批评语言学的陈述方式，如批评语言学家局限于现存文本的分析，并在分析中呈现语言与社会一对一的直接关系（田海龙，2006: 42）。在批评话语分析的后续发展过程中，批评话语分析的学者基于新的主体定位认识到福勒陈述方式的不足，并基于对这一陈述方式的反思提出“批评话语分析”的术语，形成新的陈述方式，将语言运用置于更为广阔的社会环境中，认为语言与社会之间的关系不是直接联系的，而是通过中介体间接联系的。这种新的陈述话语与社会的关系的方式通过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代克等主体的影响，同时也依托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和《话语与社会》期刊的影响，实现了知识的传播和扩展，并在关系网络中呈现和展开新的陈述，如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代克对中介体的不同界定和解释，以不同研究方法分析话语对象。

从另一个角度看，彼此定位不同的主体也可以在矛盾与冲突中影响陈述方式的话语形成。例如，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维窦森（Widdowson）、布鲁马特（Blommaert）、比力格（Billig）等人先后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政治责任、理论基础、分析方法、研究内容等问题提出质疑和批评，引发了学术争论，沃达克和费尔克劳等学者也进行了积极回应（田海龙、赵芃，2012: 10-13）。这种辩论实际上也是定

位不同的主体间建立的“差异与联系的体系”(Foucault, 1972: 50)。这一体系的建立使得差异与联系都得到进一步明确，使得批评话语分析对话语与社会关系的描述更加清晰，同时依赖于维窦森等主体定位的影响力，批评话语分析的陈述方式也得到一定推广和普及。

3 概念的话语形成

概念的话语形成与某个领域内出现并传播的陈述相关联，即这些陈述经过一定的组织程序形成概念。这些组织程序包含对其他话语的延续，与以并列、伴随或记忆的形式呈现的话语共存，在介入程序下产生变化(Foucault, 1972: 56-59)。换言之，在概念的话语形成过程中占据特殊定位的主体采用特定的陈述方式围绕具有特殊性的对象进行话语的陈述，并在以上三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中形成一套具有独特性的概念体系。

福勒在批评语言学的著述中对一系列概念进行了解释，建立了该话语特有的概念体系，展现其研究理念。福勒认为，批评语言学所提倡的批评概念不同于文学批评，而是蕴含语言中的价值判断，受到了后现代主义思潮尤其是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田海龙、赵芃, 2012: 5)。可以看到这一概念的形成包含对文学批评的转换，并与后现代主义的语言观念发生联系，形成于不同关系群的相互作用过程之中。这种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继承或复制，而是介入程序的合法运用。概念的话语形成过程是一个对其他概念进行诸如改写、转换、精确、矫正、限定、系统化等程序的过程(Foucault, 1972: 59)。值得关注的是，介入程序的运用需要具备合法性，这种合法性一定程度上来自于主体的陈述方式，即具有某种定位和有一定影响力的主体通过一定的描述赋予某些概念发生转变的合理性。正是在主体的描述中呈现了陈述的共存、重复和改变。这一点印证了福柯(ibid.: 72-73)所说的，话语形成的不同层面具有等级性，而陈述方式所构成的陈述群为概念的话语形成打下了基础。

由此可见，概念的话语形成并非是简单地依据某种知识给出定义的过程，而是在一套规则下对陈述进行配置，使陈述中的重复性要素按照彼此的排列、依附和修辞等关系得到分配，形成演变和替代的过程。知识考古学强调要关注概念形成的复杂性和不兼容性，而不是一味追求概念内在的连贯性(ibid.: 62)。就概念的话语形成而言，它发生在以各种形式共存的多个陈述的关系群当中，正如福柯(ibid.: 60)所言，各种陈述的相互联系构成的关系群组成了概念形成的系统。但他也指出，如果要形成或转换出新的概念，这一关系群中的各种陈述还需要诸如改写、转录、翻译等程序的合法介入，通过精确的介入，有的陈述被接受，有的陈述被排斥，也有被批判或被进一步解读。例如，在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过程中多

种有关批评话语分析的陈述形成相互补充、完善以及争议的关系群，有关后现代的话语理论陈述被接受下来，囿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批评语言学陈述受到排斥，话语概念通过对话语理论中的相关概念进行借鉴、改写，逐渐凸显出来，形成批评话语分析的一个重要概念，凸显出批评话语分析与批评语言学的差异，突出了批评话语分析与后现代思潮中话语理论的关联，使这一研究范式的文本分析方法不再局限于系统功能语言学。

4 策略的形成

关于策略的话语形成福柯（Foucault, 1972: 64）认为，在话语中按照一定程度的连贯、精确和稳定能够产生特定的对象重组、描述类型以及概念组织，使它们组成主题或理论，即是话语策略的形成过程。他进一步指出，策略的形成首先决定了话语可能存在的衍射点，决定在同一话语的不同对象、描述和概念之间，陈述所呈现的不兼容性、等价性和系统性，从而打开了选择的空间（*ibid.*: 65-66）。福柯（*ibid.*: 66-67）也指出，策略的运用决定了并不是所有的陈述选择都能在话语中得到实现，而是依据陈述在话语群中的运作、与其他话语的关系进行排除与抉择，从而使话语获得某种特性。他强调策略的选择受到非话语实践、话语占用和话语需求的影响，使得话语能够在特定社会实践中发挥作用，被部分人群所占用，并为满足某种需求而发生变化（*ibid.*: 67-68）。

将福柯关于策略形成的论述投射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发展变化上可以看到，批评话语分析是在多种话语构成的话语群中形成的。批评话语分析对其他话语吸收和排斥，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自身的理论体系和关注主题，建立起话语的衍射点。例如，费尔克劳和范代克等在批评话语分析领域提出的不同研究方法各自拥有关注的话语对象，采取不同的陈述方式，都可以被认为是一个话语群中的不同话语。尽管各自使用的概念有所不同，或者术语相同但内涵有所区别，但都体现着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原则。他们提供的不同研究方法和路径是以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形成为衍射点发出的不同射线。

将福柯关于策略形成的论述投射到批评话语分析的历史发展变化上还可以看到，无论是批评语言学还是批评话语分析，其研究群体的形成都对理论和主题的建立起着重要作用。英国东安格利亚大学的四位学者提出了批评语言学的相关理论，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代克等人对批评话语分析进行了诠释，他们在发表著述、参加会议、讲学授课等活动中建立了独特的理论和主题。正如福柯（*ibid.*: 68）所言，话语始终是被部分人群所占用的，只有他们可以在此话语中拥有表达的权力、理解的能力和对陈述库的使用能力。这也适合我国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近年的发展状况。学生培养、会议召开、项目开展促进研究群体不断扩大，都为批评话语分析的

策略形成和派生注入了新的活力(赵范, 2017), 催生新的对象、陈述方式和概念等。

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策略形成还需要特别指出, 批评话语分析遭遇的批评也是其策略形成的一个部分。诚然维窦森等人对批评话语分析的质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明确批评话语分析的独特性, 其本身的学术影响力也可以帮助实现批评话语分析的普及, 但这些学术大家的某些质疑还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批评话语分析的某种诉求。如维窦森曾指出, 批评话语分析的最严重问题是“将‘话语’与‘语篇’混为一谈, 把语用学简化为语义学”(辛斌, 2008: 65)。维窦森的这一质疑实际表达了对进一步明确和区别话语独特性的诉求, 虽然是为满足其质疑的需要服务, 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者对此作出了回应与努力, 由此带来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却是策略形成的一个部分。因此, 这些质疑并不是话语的阻碍因素, 而是话语策略的构成因素(Foucault, 1972: 68), 它们是必要且无法避免的, 在对这些诉求的满足中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和主题能够得到形成和发展。

四、关于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启示

从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视角考察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话语形成的历史发现, 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壮大不仅仅是其学术思想的一种呈现, 也不是对外部世界存在的社会问题的一种回应和转写。批评话语分析本身就是一个话语实践, 它的形成过程也是一套参与话语实践的规则系统。

这一系统具有等级特征。首先, 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形成过程中, 具有学术影响的学者, 包括这些学者依托的大学研究机构, 他们出版的学术著作, 甚至包括那些持有不同学术意见, 但同样具有学术影响的学者, 对于研究对象的初步分化以及在后续的陈述方式中再次确立, 都具有重要的作用。他们的重要作用还体现在批评话语分析的概念形成和策略形成上面。他们对其他概念的改写与转换、对一些话语的吸收以及对另一些话语的排斥都对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至关重要。可以说没有批评话语分析学者(包括批评话语分析的批评者)已确立的学术影响, 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也不会取得如此的成就。其次, 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被初步分化出来到陈述方式的形成, 再到概念的形成和策略的形成, 这一过程并非是一个线性序列, 而是一个层级系统, 只有被前一层级允许的陈述才能进入下一层级。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 与批评话语分析研究对象相关的陈述被接纳, 其他的则被排斥在外。在被接纳的陈述方式中, 与其一致的陈述被吸收, 如费尔克劳、沃达克和范代克关于批评话语分析的陈述, 进而成为批评话语分析领域重要的概念, 如批评、话语等概念。这些概念在策略层面经过排除与抉择过程最终呈现话语中的主题或理论体系, 形成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原则。

这一系统还具有动态关联的特征。首先, 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对象不是凭空产

生的，而是与现有的研究在连续性上发生断裂分化而产生的，具体来讲是与福勒的文体学研究产生断裂并形成初步的分化而生的。这一研究对象的确立也是在不同的话语相互辩论中实现的。在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形成过程中，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各个层面的要素彼此之间的关系总是相互关联互动的，同时也在保持批评话语分析整体理论原则的前提下不断产生话语内部的变化，发展出不同的研究流派和方法。其次，批评话语分析在经历对象、陈述方式、概念、策略的话语形成之后，既使形成了一定的影响，成为一个相对确立的范式，批评话语分析也并未达到终极阶段，依然有着发展的空间，如克瑞兹诺斯基和福特纳 (Krzyzanowski & Forchtner, 2016) 就提出批评话语分析进入批评话语研究新的发展阶段的论述(田海龙, 2016a)。因此，我们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的话语形成重要的是发现陈述间系统性和关联性的形成，发现话语形成中的规律系统。

考察批评话语分析话语形成的历史可以为我国学术界关注的学术话语体系建构议题提供某种借鉴。目前进入学者视野的话语体系各种各样，如社会主义话语体系、官方话语体系、中国话语体系、对内和对外话语体系、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话语体系、中外话语体系、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全球话语体系、国际话语体系、区域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世界承认的独立话语体系、媒体话语体系、传播话语体系、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涵盖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领域的话语体系、中国特色高等教育话语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学话语体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青年认同的话语体系、群众工作话语体系、高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教育话语体系、90 后大学生价值观话语体系、中国音乐理论话语体系、老龄社会话语体系、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自身的话语体系、国际学术话语体系、独立的学术话语体系、西方的霸权话语体系、普世话语体系等^②。尽管林林总总，但是若谈某一话语体系，还是要凸显其内部多种陈述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以及外部与其他话语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关联（田海龙，2016b），对某一话语体系进行建构也需要结合这一学科的特点围绕研究对象、陈述方式、概念和策略的话语形成进行深入细致的探讨。

从福柯对话语形成的阐释出发考察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的话语实践启发我们思考的问题或许包括新的研究对象如何从现有的研究中分化出来，谁来提出这些研究对象，他是否具有相应的学术影响力，有关研究对象的陈述在形成关系网络之后被区分、关联、重组和派生，那些进入陈述方式的陈述是如何因主体地位的不同而形成各种特质，这些陈述如何通过介入程序的作用形成概念，陈述间的各种联系如何通过选择对象、进行描述、操控概念最终在话语的各种可能性中建立规则。对这些问题进入细致地思考分析，或许较单纯地提出学术话语体系建构的建议和对策更具

有学术意义，对学术话语体系的建构亦更具实际意义。

五、结语

福柯的思想是最伟大的现代哲学之一，自从其问世以来就引发无数的解读、阐释和思考。本文亦是结合批评话语分析 40 年话语实践学习和理解福柯话语理论的一个思考之作。福柯在《知识考古学》这部著作中对之前出版的《词与物》进行了一些纠正和批评，其中一个重要的纠正就是转换术语，如用话语替代语言，用话语实践来取代符号的指称作用，用话语的重要性取代认识型的重要性（莫伟民，2005：89）。福柯对话语概念的重视体现出后现代主义的哲学思想，这不仅是批评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和源泉，也为考察批评话语分析的发展变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路径。沿着这一路径探索可以发现批评话语分析本身不是某些学者发表学术观点的纯表达行为，也不是在推理体系中运作的学术写作活动，而是“一个匿名的、历史的、有确定时空定位的”（同上：201）话语实践，其中不仅涉及批评话语分析学者的权威和影响，更涉及参与其中的多个话语的互动与角力，因而充满了矛盾、变化和不确定性。借助福柯关于话语形成的阐释可以更清晰地认识其中的奥秘，也可以受到一些启发，对其他学科话语体系的建构有一些更具建设性的思考。

注释：

- ① 关于“陈述”与“话语”两个术语，莫伟民（2005：200）也认为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指出“话语的构成是陈述的扩散和分配的原则，话语就是隶属于同一个构成体系的陈述集合。陈述处于话语范围内，按照福柯的话说，陈述是话语的原子。”
- ② 这部分内容引自南开大学张迈曾教授在第七届“当代中国新话语”国际学术研讨会（2017 年 11 月 3-5 日，南昌）上的主旨发言。

参考文献：

- [1] Fairclough, N. 1989. *Language and Power*[M]. London: Longman.
- [2] Fairclough, N. & R. Wodak. 2012.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3] Foucault, M. 1972.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M]. London: Tavistock Publications.
- [4] Fowler, R. 1966. *Essays on Style and Language*[C].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5] Fowler, R. 1971. *The Language of Literature: Some Linguistic Contributions to Criticism*[M].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6] Fowler, R. et al. 1979. *Language and Control*[C].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7] Halliday, M. A. K. 1973. *Explorations in the Functions of Language*[M]. London: Edward Arnold

- Publishers.
- [8] Halliday, M. A. K. 1978. *Language as Social Semiotic: The Social Interpretation of Language and Meaning*[M]. London: Edward Arnold Publishers.
- [9] Krzyzanowski, M. & B. Forchtner. 2016. Theories and Concepts in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Facing Challenges, Moving Beyond Foundations[J]. *Discourse & Society*, (3): 253-261.
- [10] van Dijk, T. A. 1984. *Prejudice in Discourse*[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1] Wodak, R. 1989. *Language, Power and Ideology: Studies in Political Discourse*[C].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 [12] Wodak, R. 2012. The Discourse-historical Approach[A]. In H. Tian & P. Zhao (eds.)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Essential Readings*[C]. Tianjin: Nankai University Press.
- [13] 陈中竺. 1995. 批评语言学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 21-27.
- [14] 丁建新, 廖益清. 2001. 批评话语分析述评[J]. 当代语言学, (4): 305-310.
- [15] 莫伟民. 2005. 莫伟民讲福柯[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16] 穆军芳. 2016.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进展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1995 - 2015) [J]. 山东外语教学, (6): 26-34.
- [17] 田海龙. 2006. 语篇研究的批评视角: 从批评语言学到批评话语分析[J]. 山东外语教学, (2): 41-47.
- [18] 田海龙. 2016a. 话语研究的语言学范式: 从批评话语分析到批评话语研究[J]. 山东外语教学, (6): 3-9.
- [19] 田海龙. 2016b. 跨文化交际的话语解读: 再情景化模式[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50-54, 60.
- [20] 田海龙, 赵芃. 2012. 导读: 批评性语篇分析的主要概念、原则、方法及争论[A]. 田海龙, 赵芃. 批批评性语篇分析: 经典阅读[C].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21] 辛斌. 2008. 批评话语分析: 批评与反思[J]. 外语学刊, (6): 65-70.
- [22] 赵芃. 2017. 2016 年国内批评话语分析研究综述[J]. 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 (4): 72-79.
- [23] 朱慧超, 李克. 2017. 国内批评话语分析二十年——基于文献计量学方法[J]. 华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111-117.